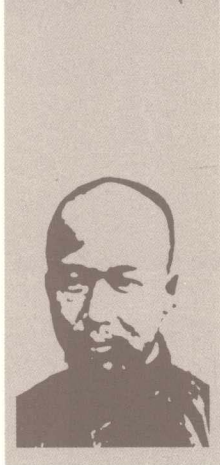




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我史》鉴注

茅海建



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我史》鉴注

茅海建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 茅海建.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5

ISBN 978-7-108-03131-0

I. 从… II. 茅… III. 康有为 (1858~1927) — 人物研究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9661 号

本课题在研究阶段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上海市重点学科 (项目编号 B405) 的资助

责任编辑 孙晓林

封面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58.25

字 数 835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83.00 元

自序

我想给康有为的《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作注，始于1998年。当时我刚刚涉足戊戌变法的研究，康有为的《我史》本应是一本必读的书，可我在阅读的时候，心情十分混乱。一方面，我已知道了黄彰健、汤志钧、朱维铮等研究先进的结论，康有为在此中“作伪”，他的这一记录不可以当作信史；另一方面，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他本人的记录虽未必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相，但恰能更准确地说明他写作、修改时的内心世界。作伪者也有作伪的理由，他为什么要作伪，本身就更加值得研究。

于是，我便产生一个念头，给康有为的《我史》做一个注本，将相关的史料与研究附注之，以能对康有为的说法一一进行厘订，鉴别真伪，重建史实，使之成为读者可以方便利用的一个读本。

然而，这一想法要能实现，却又有着很大的难度。当时我对戊戌变法的史实了解很少，相关的史料也不熟悉；更何况在我之前的许多研究先进，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他们没有去做，并非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此中的意义，而正说明了此处水深。于是，我把这一念头收了起来，开始研究戊戌变法的具体事实。

无论什么人研究戊戌变法，都绕不开《我史》，我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再读之，但在研究论文中不敢轻易使用。每一次读到它，为之作注的念头就加一分。到了2003年，正值我的前一研究项目结项，想申请新的研究经费的支持，于是我就试着将其作为课题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报。不料的是，这一申请很快被批准，反成了有进无退、立限克工的督战力量。

我自知是研究戊戌变法的新军，相关的经验与史料的掌握还谈不上熟悉。我只能靠更多的阅读，更多的查档，不敢聪明为事，更不敢臆测自判。前前后后，用了五年的时间，大体上完成了这一工作。我不认为

我现在的工作已近乎完备，也准备今后有着多次的修改，尽管已将本书交付出版——我正等待着来自读者的批评意见。

虽说为《我史》作注，还是第一次，但相关的研究早已进行。我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黄彰健、汤志钧、孔祥吉三位先进的贡献。其中黄彰健以史识优出，台湾所藏的文献档案也多览之；汤志钧史料烂熟，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汪康年师友手札的最初利用者；孔祥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多有斩获，北京地区各大图书馆中所藏书信也为其观览，解读人物间相互关系为其所长。三位先进的著述，或直接释明了《我史》中的章句，或间接考清了《我史》所言及的史实。^{〔1〕}因此，本书中的很

- 〔1〕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1970年；《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的再检讨》，《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9年；《论〈杰士上书汇录〉所载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第七书曾经光绪改易并论康上光绪第五书确由总署递上》，〔台北〕《故宫学术季刊》，第九卷（1991年），第1期；《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台北〕《大陆杂志》，第八十六卷（1993年），第3期；《论谭嗣同狱中诗：与孔祥吉商榷》，《大陆杂志》，第九十卷（1995年）第2期；以上合编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康有为戊戌真奏议》，〔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丛刊，1974年；《戊戌变法与素王改制》，《谭嗣同与戊戌维新》，岳麓书社，1999年。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1961年，1984年增订本；《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修订本；《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以下简称《乘桴新获》）；《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康有为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维新·保皇·知新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丛书，1998年（以下简称《救亡图存的蓝图》）；《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年（以下简称《晚清佚闻丛考》）；《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年。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巴蜀书社，2004年；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翁文恭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此外，还应提到萧公权与姜义华。前者所作《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虽写得很早，史料上亦稍欠足，但其识力及其对康学术及内心世界的入木分析，屡读屡有新意。后者与张荣华编校最新版的《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是目前最全的康有为文集，使用方便。又，本书对各位先贤先进皆直呼其名，以为省文。

多地方是直接采用了他们的成果，我在注释中也予以说明，在此谨表敬意。

还有许多研究者的成果，或为我采用——那是可以用合乎“规范”的方式予以说明；或刺激了我的思路——那就无法“规范”地一一说明了。后者人数很多，其中需要特别提出者是朱维铮、杨天石、杨国强、罗志田、马忠文等（以年秩为序）给予我多方面的帮助。^{〔1〕}我的朋友罗志田教授在其著作中多次出现的一段话，很得体地表达了我的惶恐：

“由于胡适研究近年偏热，论著甚多，而现行图书发行方式使穷尽已发表刊出的研究成果成为一非常困难之事。个人虽已尽力搜求，难保不无缺漏。另外，因论著多而参阅时间不一，有时看了别人的文章作品，实受影响而自以为己出者，恐亦难免。故凡属观点相近相同，而别处有论著先提及者，其‘专利’自属发表在前者，均请视为是本书利用他人成果而未及注明，还请读者和同人见谅。”^{〔2〕}

戊戌变更是长年的热门，罗教授提出的搜集之难与受影响而自以为己出，对我也是同样的存在。我自当尽力避免之，若有犯规，亦请读者和“专利”所有者见谅并予指正。

感谢中国国家博物馆保管二部，当我接到康有为《我史》手稿本收藏消息的电话，正在昂坪到宝莲寺的新建缆车上，一下子有着福光大现的身受，2006年10月我在该馆装修前的库房，度过了至今仍清晰在目的四天。感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管利用部，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感谢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郭廷以图书

〔1〕 朱维铮虽非新史料发现者而著称，但许多旧史料由其识出新意。曾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康有为卷》、《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康有为大同论二种》、《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新学伪经考》，撰写了三篇颇有意义的前言。（后编入《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杨天石发现毕永年《诡谋直纪》，证实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武装夺权计划，史料解读能力强。杨国强与我多次讨论戊戌变法，时夜有不眠，获识甚多。罗志田到北大后，多言惠我，兼及学术与人生。马忠文时有直言，且多赠我所需之书。

〔2〕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

馆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那里有着第一等的效能。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我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三个月，完成了本书最初的整合，香港又正是康流亡生涯的第一站。感谢东京大学大学院总合文化研究科，使我有足足半年的时间，来思考和修改本书的细节，坐在同一个城市，思索百余年前康有为写作《我史》之情景，心情宜于相系，也有历史跨隔缩小之感。为此，谨向在以上事情上帮助过我的朱凤瀚、安莉、冯明珠、王汎森、陈永发、科大卫、村田雄二郎等诸位女士和先生表示谢意。我还需感谢我现在服务的机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这里有求知的学生和向学的风尚，且越来越像是一个学术的重镇而扫荡着因循的习气。我到此已经九年了，也渐渐生出融入的感受，尽管不久后将无奈地离身而去。

在本篇序言的最后，我还必须特别地申明我对康有为的敬重。

本书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证伪。如果说“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话，那么，我已将怀疑放到了较大。也因为如此，本书看起来有点“专揭老底”的味道。康有为确实不会想到，他的这部生前还没有来得及发表的回忆录，后来居然会有人以档案、文献一一严格核对。我的这种般般较真，当然不是与康有为过不去，而是为了能够真切地看清楚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的一幕幕重要场景。康有为确实在《我史》中有一些作伪，但不作伪的政治家又有几何？职业历史学家的责任与本事，不正是破译作伪的证词，揭开被掩盖的谜底？更何况康的一生处处失败，若没有“康式”自我打气，恐怕是早已气馁。

与康有为同时代的孙宝瑄，在康风光的那些日子里，看不太起康，但到了康倒台后，反而在日记中写了几句公道话：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诣《昌言报》馆，枚叔（章太炎）、浩吾（叶瀚）咸在，问傅相（李鸿章）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语毕大笑。傅相询余是否康党？余答曰：‘是康党。’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

‘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陞辞时，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枚叔等闻皆大笑曰：‘奇事，康以六品官，而宰相为之党，未之前闻！’故都人多目为康党。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合肥（李鸿章）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

“有人劾余为康党，余曰：‘合肥在都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1〕

而戊戌变法主将之一张元济，在政变后写信给与康、梁有隙的汪康年：“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2〕细心地想起来，康也是一个真了不起的人，以一介书生，年方四十，却创造了历史的伟大画面。〔3〕当时与今天的人们，可以向康提出无数指责，康也确实有着种种毛病，但历史的最奇妙之处就在于不可重复性。事情已经发生了，假设

〔1〕 孙宝瑄：《日知录》，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7—198页。此段日记属丁文江托余绍宋（樵园）在杭州孙家抄来的，摘要录于梁年谱。（后出版《忘山庐日记》时，已不见此一年的原本）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为1900年1月12日。翦伯赞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以下简称《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539—540页亦录有此段，文字稍有误。孙宝瑄（1874—1924），字仲珩、仲愚，户部侍郎孙诒经之子，驻法公使孙宝琦之弟，其妻父李瀚章，两广总督，李鸿章之兄。孙此时在上海，与宋恕、章太炎等人交善，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评康学，十二月十九日起读《新学伪经考》，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读《孔子改制考》，多作驳词及评语。政变后与人争论开议院及废四书文，“然后知南海得志时，首变考试为得要也。”见《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上册，第120—122、151、153—154、216—231、293页。又，孙宝瑄于甲午战后曾上书李鸿章，要求仿效西方进行改革，特别是建报馆与学堂。（《上合肥傅相书》，乙未〔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日，《万国公报》，第88号，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1968年，第25册，第16023—16025页）

〔2〕 张元济致汪康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38页。

〔3〕 孙宝瑄于光绪二十三年入京，七月初五日访李鸿章，谈其治国之方略。该日记：“谒合肥相国，纵谈。合肥言：汝海上来，作何名论，至此都无用。吾大臣，天子之牛马。汝辈犹蚍蜉。予答曰：然则百姓如草芥矣。”（《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上册，第123页）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开展之难。

再多，也只能是寄托着一种心情而改变不了历史的本身。

康的业绩是不能否认的，康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康的粉饰也是应当擦去的。这一切本来应该是不矛盾的。“尊尊”、“贤贤”不再是今日历史学家的工作态度，他们的工作，只能是“求真”，无论对待何等样的伟人，均应予以平视，并作平心之论。

天色暗了，窗前的树暗了，我的心也暗了。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心。

茅海建

2008年2月于白金台

目 录

自 序 1

导 论 1

- 手稿本、抄本与写作时间 2
- 刊印与书名 9
- 《我史》“鉴注”的时段 12
- 《我史》的真实性 14
- 礼送康有为出日本 17
- 光绪二十四年岁暮康有为写作时的心情 22
- “鉴注”的方式 25

《我史》光绪二十年——二十四年鉴注

光绪二十年 甲午 (1894)

- 导读 31
- 20·1 第一次进京会试 31
- 20·2 余联沅弹劾《新学伪经考》 37

- 20·3 曹泰之死 45
- 20·4 第一次桂林讲学 47
- 20·5 甲午战争与“上清帝第一书” 50
- 20·6 桂林山居与著书 53

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1895)

导读 55

- 21·1 陈千秋之死与“同人局” 55
- 21·2 第二次进京会试 61
- 21·3 张荫桓赴日议和被拒 63
- 21·4 《马关条约》与“公车上书” 63
- 21·5 “联省公车上书” (“上清帝第二书”) 69
- 21·6 《马关条约》画押 76
- 21·7 光绪帝战后改革之朱谕 84
- 21·8 康有为会试中式 86
- 21·9 授工部主事不就 92
- 21·10 “上清帝第三书”之进呈及光绪帝下发改革诸奏章 96
- 21·11 “上清帝第四书” 104
- 21·12 京师修整街道 109
- 21·13 开办《万国公报》(强学会) 112
- 21·14 与翁同龢之相会 115
- 21·15 翁同龢改革愿望与毓庆宫之妒 118
- 21·16 弹劾徐用仪 123
- 21·17 弹劾潘赞清 127
- 21·18 倡立强学会 129
- 21·19 与李提摩太之交往及西人参助强学会 134
- 21·20 强学会的捐款收入与内部矛盾 141
- 21·21 康有为离开北京及强学会被封 144
- 21·22 游历天津、山海关 149
- 21·23 与张之洞之南京相会，创办上海强学会 150
- 21·24 杨文会仪器款项 154
- 21·25 返回广东与《强学报》停刊 156
- 21·26 慈禧太后之逆施 160

21·27 康有为晚年所写之眉注	171
------------------	-----

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 (1896)

导读	172
----	-----

22·1 万木草堂	172
22·2 康广仁、何廷光与《知新报》	173
22·3 “同人局”购书	179
22·4 第二次赴桂林	180
22·5 搜集日本书籍	181

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1897)

导读	184
----	-----

23·1 第二次桂林讲学与圣学会	184
23·2 回粤讲学、筑室花埭、再赴上海	194
23·3 巴西移民计划与赴京疏通	197
23·4 “上清帝第五书”、为王鹏运等人拟奏折	211
23·5 翁同龢挽留康有为，高燮曾奏荐入“弭兵会”	221
23·6 杨深秀欲保康有为，张仲炘与康有为之关系	235
23·7 运动京师各学会	238
23·8 德国占领胶州湾	241
23·9 联日本策与对日赔款延期	246
23·10 为杨深秀、陈其璋拟联英、日折，康有为对英国之认识	254
23·11 作联英、日策而未被采纳	266
23·12 英、俄贷款之争	270
23·13 自开通商口岸	277
23·14 大同译书局	280
23·15 “经济特科”	283

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1898)

导读	288
----	-----

24·1 总理衙门约见	288
-------------	-----

- 24·2 “上清帝第六书”与《戊戌奏稿》之作伪 295
- 24·3 京师各省学会 302
- 24·4 “上清帝第六书”交总理衙门议复 305
- 24·5 “上清帝第七书”与进呈《俄彼得变政记》 306
- 24·6 上书联英、日拒割旅、大，再度发动联省公车上书 308
- 24·7 为文悌拟奏折 325
- 24·8 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 328
- 24·9 “昭信股票”发行 335
- 24·10 “英德续借款” 340
- 24·11 为宋伯鲁、陈其璋拟奏折派容闳赴美筹巨款办新政 343
- 24·12 请改律例 355
- 24·13 创立保国会 357
- 24·14 孙灏攻保国会，潘庆澜弹劾保国会，《国闻报》上的反击 367
- 24·15 康有为欲回广东，光绪帝催促总理衙门议复“上清帝第六书” 379
- 24·16 与日本“合邦大会” 386
- 24·17 为杨深秀、徐致靖拟奏折，促发百日维新之旨 390
- 24·18 为杨深秀、徐致靖、宋伯鲁拟请变科举、废八股等奏折 398
- 24·19 与李盛铎之关系 408
- 24·20 徐致靖奏荐“备顾问”，翁同龢之罢斥 412
- 24·21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 425
- 24·22 授总理衙门章京 439
- 24·23 上奏谢恩并进呈《孔子改制考》 442
- 24·24 废“八股”改“策论” 454
- 24·25 奉旨进呈奏折书籍，未就总理衙门章京职 458
- 24·26 生童岁科试请即改策论 463
- 24·27 设立特许专卖制度 466
- 24·28 为杨深秀、宋伯鲁拟奏折请定阻挠新政罪 470
- 24·29 弹劾许应骙 474
- 24·30 文悌弹劾康有为 478
- 24·31 优拔贡朝考改策论，科试之经史分科 486
- 24·32 请各省开设高等学堂、中小学堂 492
- 24·33 第二次进呈《日本变政考》 496
- 24·34 进呈《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等书 502

- 24·35 《京师大学堂章程》之起草 512
- 24·36 孙家鼐执掌京师大学堂与总教习之争 521
- 24·37 孙家鼐请删康有为书中孔子改制字样 531
- 24·38 张百熙保康有为“经济特科”，康党的保荐、保举攻势 535
- 24·39 康有为请在上海等处设立商务局 541
- 24·40 宋伯鲁请派梁启超督办上海《时务报》 549
- 24·41 康广仁要求康有为回粤办学 556
- 24·42 荣禄在天津的所作所为 560
- 24·43 孙家鼐请派康有为去上海督办《时务官报》 567
- 24·44 廖寿恒为康有为代递书籍条陈，孙家鼐上奏《时务官报》办法 572
- 24·45 “制度局”、“议政处”、“立法院” 576
- 24·46 李端棻请开“懋勤殿” 580
- 24·47 总理衙门议复“上清帝第六书”，光绪帝命“另行妥议具奏” 585
- 24·48 军机处、总理衙门再次议复“上清帝第六书” 589
- 24·49 议复“上清帝第六书”诸后果 603
- 24·50 设立“农工商总局” 608
- 24·51 汪康年改《时务报》为《昌言报》 614
- 24·52 陈宝箴奏请《孔子改制考》自行毁版 626
- 24·53 湖南新旧两派之争，杨深秀请力除积习 629
- 24·54 弹劾谭钟麟、松蕃 636
- 24·55 “万寿节”庆祝、新政谕旨刊刻誊黄 641
- 24·56 徐致靖奏请开“编书局” 648
- 24·57 进呈《波兰分灭记》与光绪帝赏银 649
- 24·58 王照上书与罢免礼部六堂官 656
- 24·59 司员士民上书 662
- 24·60 光绪帝召见保举官员 666
- 24·61 新任军机四章京“参预新政” 668
- 24·62 曾廉上书弹劾康、梁 674
- 24·63 光绪帝任用军机四章京之“深意” 680
- 24·64 康有为上书“官差并用”与光绪帝裁汰冗员 685
- 24·65 徐致靖奏请设“散卿” 691
- 24·66 新任礼部堂官，阔普通武请设“议院” 694

- 24·67 京外士民亦可上书 701
- 24·68 懋勤殿的政治设计，欲留黄遵宪主持新政 702
- 24·69 光绪帝欲开“懋勤殿” 706
- 24·70 “设立参谋本部”、“改元变服”、“迁都上海” 714
- 24·71 游说袁世凯 722
- 24·72 徐致靖保袁世凯，光绪帝密诏 730
- 24·73 八月初二日明谕康有为赴上海与光绪帝第二道密诏 737
- 24·74 立山、杨崇伊、荣禄、李联英等人请训政 742
- 24·75 荣禄“调兵”与杨崇伊八月初三日递折 747
- 24·76 谭嗣同八月初三日夜见袁世凯 753
- 24·77 康有为八月初三日晚的活动及初五日袁世凯请训 762
- 24·78 与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的会见，欲聘其为顾问 765
- 24·79 康有为初五日离京，慈禧太后政变 777
- 24·80 上海英领事派人救康并护送至香港 782
- 24·81 康有为到达香港及家人逃港澳 792
- 24·82 康广仁被捕 794
- 24·83 张荫桓被捕 798
- 24·84 荣禄入京，“飞鹰号”的行动 799
- 24·85 梁启超逃亡 801
- 24·86 谭嗣同被捕，王照逃亡 808
- 24·87 杨深秀被捕 811
- 24·88 杨锐、林旭、刘光第、徐致靖被捕经过 812
- 24·89 “六君子”就义，张荫桓等人之处置 816
- 24·90 陈介叔、梁元理赴京拾康广仁遗骨未果 824
- 24·91 康广仁事迹 825
- 24·92 文悌弹章之后果 826
- 24·93 上海捕梁启超之行动 828
- 24·94 广东捉拿康、梁之行动及抄没家产 830
- 24·95 从香港中环警署转居何东家 836
- 24·96 与贝思福勋爵在香港会谈 837
- 24·97 康有为东渡日本 842
- 24·98 改革派人士之处置及改革措施被废止 847
- 24·99 “十一不死” 859
- 24·100 写作动因与时间 862

附 录

《我史》手稿本所录注文、跋语	867
韩文举注文	867
叶湘南跋语	868
伍庄跋语	869
刘翰棻跋语	870
孔昭焱跋语	870
钟玉文跋语	871
吴恒炜跋语	872
郑雪庵跋语	872
鲍文跋语	873
张砚瑜跋语	874
叶衍华跋语	874
孔昭鑫跋语	875
顾颉刚抄本所录丁文江之跋语	876
征引文献目录	877
索引	895
人名索引	895
奏折、条陈索引	910

导 论

很长时间以来，戊戌变法的研究，依据着三大史料：其一、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其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其三、康有为的《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现有的主流看法与结论，很大程度上还是从这三种史料中得出来的，尽管许多研究先进对此有了已经不新的研究成果。

首先发现其中差误的，是台北的黄彰健，他依据 1958 年北京出版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发现了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作伪。黄彰健当时不能来北京看档，他的贡献很大意义上是提出了假设；而 1981 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的发现，为他提供了近乎完美的证明。^{〔1〕}此时北京的孔祥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读中，多有贡献，大体完成了对康有为奏折查寻与核对。可以说，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真奏稿，现在已经有了可靠的本子。

其次是对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研究，先后有刘凤翰、狭间直树、戚学民等多位研究先进投入工作，也出产一大批有价值的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梁著的版本进行了核对，寻思其写作及改动的原因。通过他们的工作，今天的人们对于梁所称“将真迹放大”一语，有

〔1〕《杰士上书汇录》尚未能影印，但目前方便利用的有三个版本。其一为黄明同、吴熙钊编著：《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年，该书附有《杰士上书汇录》，并标明卷数，总理衙门代奏原折亦照录；其二是孔祥吉编：《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其三是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 4 集。后两种书收入《杰士上书汇录》和其他康有为代拟的奏议，卷数有所打乱。以上三种版本，文字与标点稍有差异，但不影响使用。